

人生意义的 重建及其限制

“潘晓难题”的文学展现
(1980~1985)

朱 杰◎著

人生意义的重建 及其限制

“潘晓难题”的文学展现（1980~1985）

朱 杰◎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意义的重建及其限制：“潘晓难题”的文学展现：
1980~1985 / 朱杰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5
ISBN 978 - 7 - 5097 - 5140 - 4

I. ①人… II. ①朱… III. ①人生观 - 研究 ②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文学研究 IV. ①B821 ②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4890 号

人生意义的重建及其限制
——“潘晓难题”的文学展现 (1980~1985)

著 者 / 朱杰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经济与管理出版中心 (010) 59367226

责任编辑 / 李延玲 高 雁

电子信箱 / caijingbu@ssap.cn

责任校对 / 丁爱兵

项目统筹 / 高 雁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3.5

版 次 /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字 数 / 173 千字

印 次 /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5140 - 4

定 价 / 5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摘 要

本书以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上的潘晓来信为引子，将潘晓在信中所暴露出来的两难之境——一方面，毛泽东时代的理想不再可信；另一方面，为那一理想所打造出来的“精神结构”又需要理想来填充——概括为“潘晓难题”。本书将“潘晓难题”视为一个创作母题，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有一系列重要作品，都试图回应此难题并给出自己的解决办法。

本书第一章详细比较了《青春之歌》与《北极光》，发现当“新时期”的“林道静”出现时，她竟然找不到可以引导她的“卢嘉川”。接下来，本书将另外两部在当时引起争议的小说引入讨论，并分析指出，《北极光》中的“引导者”的困境其实颇具典型性，而20世纪80年代“历史观”的巨大变化，正与此困境的产生有着重大的联系。笔者认为，这一找不到“引导者”的困境，其实颇具“隐喻”性质——自此之后，怀抱“潘晓难题”的人们，将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尝试找出将自身纳入“共同体”之中的方式。

第二章处理的是所谓工业题材。笔者认为，在新的时期，工业题材中的“正面人物”形象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毛泽东时代“又红又专”的工人，到现在既具“管理知识”又能认可“管理者”的优秀工人这二者的结合——《赤橙黄绿青蓝紫》中解净与刘思佳的组合，正是实现这一“结合”的尝试。因此，一方面，是旧的“革命政治”动员方



式遭到唾弃；另一方面，是新的诉诸“现代化”的动员方式的崛起。但是，新的诉诸“现代化”的方式，又有使工人乃至整个社会重新陷入“异化”状态的危险前景，面对如此困境，此时期“工业题材”创作的领军人物蒋子龙率先选择了放弃此种尝试。

第三章处理的是所谓军旅小说。一方面，面对新时期巨大的“政治冷感”，传统的政治动员方式正遭遇巨大的危机——《高山下的花环》中需要自我救赎的，恰恰是一位“指导员”，这正是对此种危机的表征；另一方面，为了赋予“个人”献身“国家”这件事情以合理性，人们又不得不动用“乡土中国”的叙事和修辞资源，以“农村妇女”的“传统美德”来针砭那些自私自利者。值得注意的是，当人们还是依照传统的笔法来创造“英雄”时，他们似乎终归难免落到进退失据的“无根”状态。

第四章以《人生》为中心，讨论了被“军旅文学”引以为据的“乡土中国”意义的变迁。在董加耕的时代，农村被赋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理想的重要意义，而在“新时期”，路遥笔下的高加林身上所代表的“现代化”蓝图，似乎构成了对于古老“乡土中国”的正面否定。

第五章围绕“王润滋论题”与张炜的创作，探讨了“现代化”叙事本身面临的问题。“王润滋论题”所展示的，是“乡土中国”的“美德”与“现代化”之间的对抗关系；张炜的写作则试图破解此难题，即一方面告别“传统道德”，另一方面又试图将代表“现代化”的力量表述为为乡村谋利益而非与乡村对立，但是，这样的尝试并不成功；与之相对应，他笔下的主人公也表现出“哈姆雷特”式的“孤独”。

在结论部分，笔者认为张炜小说“孤独者”的出现，其实正表明“潘晓”们重新讲述“正面”故事、塑造“正面人物”的失败——因为刘思佳、赵蒙生、高加林和李芒们，最终都没能将自己成功地纳入某

一“共同体”（对刘思佳们而言是“工人阶级”、对赵蒙生们而言是“国家”、对高加林们而言是“乡土中国”、对李芒们而言是“弱势群体”），而他们的尝试之所以失败，恰恰正是因为他们“革命政治”之外另觅资源以支撑“正面人物”的企图，似乎并未获得成功。另一方面，以1985年为界，在文学创作中，一大批“孤独”的“个人”开始涌现，“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矛盾的展现方式，也以“个人”对“共同体”彻底反叛为特点——那种竭力想将“个人”稳妥地安置于“共同体”之中的努力，也就此告一段落了。

目 录

导论 “潘晓难题”	/ 001
第一章 “引导者”的困境与危机	/ 035
第一节 “引导者”的困境	/ 035
第二节 既有“引导”方式的危机	/ 050
第二章 “日常生活”与“管理”	/ 064
第一节 “日常生活”的介入	/ 065
第二节 “哥们义气”、“管理”和“工人阶级”	/ 077
第三章 “无根”的英雄	/ 103
第一节 最后的“指导员”	/ 103
第二节 “无根”的英雄	/ 113
第四章 “知识”与“乡土中国”的危机	/ 126
第一节 从加耕到加林：“理想”的失落	/ 126
第二节 “知识”与“乡土中国”的危机	/ 139



第五章 “孤独者”及其成因	/ 157
第一节 回应“王润滋论题”	/ 157
第二节 “孤独者”的出现	/ 176
结论 从“理想主义者”到“俗人”	/ 191
参考文献	/ 199
后 记	/ 205

| 导论 |

“潘晓难题”

“二十年前的那个五月，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在不经意中翻开这个封面的！翻开这封面，他们就猝不及防地发现，他们翻开了一片电场、一声惊雷、一阵震撼……”^①

为回忆者如此虔诚追念的“二十年前的那个五月”，乃是指1980年的5月；“这个封面”所代表的杂志，乃是1980年第5期的《中国青年》；被回忆者喻为“一片电场、一声惊雷”的，正是刊载于该期《中国青年》上的“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时间”、“地点”、“人物”皆已齐备，可是在那“电场”与“惊雷”之中，究竟上演了怎样惊心动魄的一幕呢？

还是先来看看“幕布”甫一拉开时的情景吧：

编辑同志：

我今年二十三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

^① 彭明榜：《“潘晓讨论”始末》，彭波主编《“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第3页。



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①

语出惊人：“尽头”、“灰白”、“失望”、“绝望”、“自我”——这些词语，似乎猛地从人们早已循规蹈矩遵循若干年的话语结构之中奔突而出；而末尾一句，作者爽性挑出自己由“无私”到“以自我为归宿”的思想流变史，更是直接挑战了若干年来人们的“阅读期待”！作者接下来的几段话，怕是更容易激起时人的认同：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的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还曾把保尔关于人生意义的那段著名的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本的第一页。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后来，我偶然看到一本过去出的小册子《为谁活着，怎样做人》。我看了又看，完全被迷住了。我开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对人生的看法：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

① 潘晓：《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本书所引“潘晓来信”的文字皆从此出，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崇高信念，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我陶醉在一种献身的激情之中，在日记里大段大段地写着光芒四射的语言，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着英雄的样子。

可是，我也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这就是，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呢？我很矛盾。

为保尔和雷锋的英雄事迹所召唤，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这样的成长史，大概对每一个“毛主席的孩子”而言都不陌生。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家人被迫畏畏缩缩的表现、亲人之间关系冷酷一面的暴露，以及作者对“组织”、“友谊”、“爱情”等的失望，都与作者以前惯熟的“人生的意义”相左、矛盾、冲突，由此，作者也陷入了深刻的迷茫之中：

为了寻找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流芳百世”“遗臭万年”者并不多；如说为人类吧，却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了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了一点小事骂碎了街，何能奢谈人类？如说为吃喝玩乐，可生出来光着身子，死去带着一幅皮囊，不过到世上来走一遭，也没什么意思。有许多人劝我何必冥思



苦想，说，活着就是为了活着，许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人生、意义，这些字眼，不时在我脑海翻腾，仿佛脖子上套着绞索，逼我立刻选择。

我求助于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希望从那里得到安慰和解答……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想呀，使劲地想，苦苦地想，我平静了，冷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人毕竟都是人啊！谁也逃不脱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理想。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崇高的人……过去，我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想起来又是多么可笑！

作者在这里的心境、态度，应该说是焦灼而矛盾的：一方面，她似乎想用自己对生活冷酷面（“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发现来说服自己“安静”下来——于是，在后面的文字中，“看透”了的作者，说出了那句轰动一时的话：“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但是另一方面，作者又是一位对生活的“意义”充满了急切渴望的、躁动不安的追寻者——“有许多人劝我何必冥思苦想，说，活着就是为了活着，许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人生、意义，这些字眼，不时在我脑海翻腾，仿佛脖子上套着绞索，逼我立刻选择。”——以至于即使有对现实的冷静分析摆在那里，作者也无法彻底释怀：“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一个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

所谓“进退失据”，大概也正是作者此刻心态的写照。

因此，一方面是“意义”的失落，另一方面，却又是对“意义”的强烈需要。如果说，伴随她成长的那些“意义”的失落，看来是事出有因的因而对她来说尚可接受的话，那么现在，抬眼望去，前路茫茫，若一路走去，将很可能缺乏任何明确“意义”的指引——这令作者感到了极度不安。“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这里的问题，应该是两个：首先，“个人”从原先的意义系统之中“滑落”而出；其次，这个需要意义的“个人”，她希望自己能与新的意义“对接”，却发现其实没能“对接”上——身处此无着无落的境地，作者方才由衷地发出了那句震撼了一代人的感慨：“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然而，陷入困境的作者，却也并非彻底无助。她告诉我们，现在，“文学”成了能够令她暂时心安的寄托：

当然，我不甘心浑浑噩噩、吃喝玩乐了此一生，我有我的事业。我从小喜欢文学，尤其是在历尽人生艰辛之后，我更想用文学的笔把这一切都写出来。可以说，我活着，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它——文学。

于是，一份“思想危机”的记录，以“意义”的失落始，最终却落脚到“文学”之上——我们在这“思想”与“文学”之间，究竟能够感觉出怎样的张力？

我们的分析，还是先从“潘晓来信”开始吧。



此信一发表，立刻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① 关注的原因，首先当然是其时弥漫于社会之中的“信念危机”：实际上，就在“潘晓来信”之前，《中国青年》上就已经有对所谓“看透”问题的讨论，其所反映的社会情绪，与“潘晓来信”所反映的，有诸多相同之处；而“潘晓来信”发表之后，能够在短时间内引起全国范围的热议，也说明“潘晓来信”的确应和了其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情绪和心理。当然，对于这一时代情绪和心理，我们当然可以从诸多方面加以解说^②；本书则拟从

① “刊有‘潘晓’信的那期杂志是5月11日发行，14日编辑部就开始收到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17日上升到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之后一直保持在每天1000件左右。据6月9日的统计，不足一个月就收到了两万多件。对于读者来信的涨势，马笑冬……介绍得很形象：‘开始几天，邮局的人是用背的那种小邮包送信，不久后就改为大邮袋了，再到后来每天都用‘蹦蹦车’。”（彭明榜：《“潘晓讨论”始末》，彭波主编《“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第14页）

② 美国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对于毛泽东时代中国教育的分析，似乎可为我们提供社会学方面的借鉴。谢淑丽认为，一个社会在面对“机会分配”的问题时，或依据个人的才能，或依据个人与生俱来的特征（如种姓、性别等）。以改造社会、创造“新人”为目标的革命中国，则将“机会分配”与“德性统治”联系起来：那些最好地示范了“革命”所鼓励与期待的“德性”的人，得到机会的比率也更大。

革命中国之所以选择“德性统治”，原因有三。第一，它有利于促进社会转型。“通过对政治忠诚、行动积极、平等主义和合作行为的嘉奖，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们试图以此激励全体人民都来实现这些道德价值。”第二，通过“德性”来召唤、动员民众，其成本较物质刺激更低，由此可以充分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以弥补资金等的不足；同时，“毛泽东也希望……就像某种集体主义形式的新教伦理一样，‘被组织起来的德性的力量’也能够刺激经济的增长。”第三，对“德性”的表彰，有利于统治的巩固，并获得政权的合法性。“较之依照才能或出身进行的分配，德性统治更有利于政治控制。因为政治意义上的德性的定义是宽泛和灵活的，精英们可以利用这一德性标准提拔他们的忠实拥护者、对那些潜在的威胁者则降级另用。如此创造出来的政治上成功的阶梯，使得他们能够孤立和弱化商业集团、知识分子集团或贵族集团，这些集团的权力部分地来自其能人地位或者世袭地位。例如，所有想要申请进入大学的人，都得接受政治和学术水平的双重考察，（转下页注）

(接上页注②)这就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们更加难以在学校和大学里建立自己的权力基地，这也使得资产阶级家庭更加难以维持其历来就有的对工人和农民家庭的优越性。德性统治同样是新政权之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与韦伯所说的克里斯玛一样，德性是一种个人素质，且为群众所珍视。当革命领导者们奋不顾身地投身于推翻旧政权残暴的压迫者的斗争之中时，他们已经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德性统治所倡导的平等主义，又进一步使得新体制合法化；在以前的能人制或世袭制统治下无所作为的团体——在中国，就是工人和农民——认为德性统治增加了他们获得成功的机会。”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社会的“机会结构”，则呈现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机会有限。“尽管精英的位置在所有社会都属稀缺，在一个像中国这样通过控制劳动力分配和城乡移民来限制现代城市部门发展的体制中，令人向往的机会就显得格外稀缺。”第二，城乡差别。城乡差别使得城市与农村的生活水平具有显著区别，同时由于中国采取严格的“城乡分治”，农村人口也无法轻易获得城市户口。第三，整体性的分配。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国家垄断了对一切机会的分配。“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教育水平与职业之间有特别紧密的配合之处，而且职业与获得商品和地位之间也有特别紧密的配合之处。职业不仅是个人收入的主要决定因素，它还是获取消费品、社会尊重和政治影响力的主要决定因素。官员和科学家拥有大量的消费机会、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权力，而尽管名义上是社会尊重的对象，农民实际上却为社会所看不起，又贫穷又没有权力。”

但是，有几个因素使得人们普遍对“德性统治”之下的“机会分配”感到不满。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评判标准的模糊与主观——判断一个人思想是否先进，唯一的标准就是看他的行动，但是对一个人行为的评价却可以有多种（比如从行为的结果来判断，或者从行为的动机来判断）。而且，判断标准的模糊与主观，也使得弄虚作假、做表面功夫的现象泛滥开来。而由于真正的积极分子与弄虚作假者之间很难区分，这也就给领导部门的武断留下了空间。第二，评判一个人——比如一个学生——品德是否良好，参与评判的人不仅有老师和学校领导，还包括他自己的同班同学，特别是其中的党团员和学生积极分子，这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方面，由于党团员拥有对一个人进行政治评判的权力，为了保证自身政治上的安全，最为安全的策略是对其敬而远之；另一方面，那些在政治上居于高位的党员或团员同学，出于维护自身地位的需要，也不愿意让过多的新人加入。第三，“德性统治”之下的竞争造成了人们之间的互相伤害。“在中国和其他革命政权之中，德性行为必然包括在其同事看来代价高昂的行为。品德良好者被要求监视其他人，并在公开场合对其加以批评和上报领导。对德性体制之下的政治生活来说，互相批评和互相监督……是其核心。每个人都被希望参与其中……”（转下页注）



“文化政治”^①的角度入手，展开一些初步的分析。

（接上页注②）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德性统治”便已造成如下的严重社会后果：一是投机行为的蔓延，人们越来越趋向于认为某个人的“善于表现”其实是出于虚伪而非真诚；二是溜须拍马、寻找靠山；三是对“积极分子”敬而远之，因为“积极分子”永远是少数，其他人为了不使自己的缺点错误成为“积极分子”的晋身之阶而选择与他们保持距离。

而“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则使得情况进一步恶化。“文化大革命”乃是毛泽东对解放后17年中国社会严重弊端——官僚精英和阶级特权的生长、资产阶级智识和社会价值的延续以及革命热情向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蜕变——的应急之策。他认为这些弊病并非源于残余传统的影响，而是现存制度的产物。然而，他的药方却是增强而非打破德性统治。他支持用更多的政治教育、更多的相互批评与斗争、更多的群众动员以及对积极分子更多的提拔，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他希望通过增强德性统治来对抗能人统治和世袭统治的威胁。他将诸如学术水平测试和工业技能等级制等能人政治实践，视为资产阶级集团在学术和经济体制中持续占据统治地位的基础。在他看来，强调阶级出身的世袭制实践，很大程度上要为懒惰而又自满的官僚精英力量的增长负责，他们更为关心的是为其子女大开方便之门，而不是为人民服务。据他分析，个人野心、投机主义和利己主义等问题，不是因为德性统治太多了，而是因为德性统治太少了。”

但是，“文化大革命”并没有使机会变得更为平等。在教育方面，依照其人的政治思想水平推荐入大学的政策，由于前述评判标准的模糊与主观和缺乏客观监督，成为了手握实权的官员们为其子女徇私的工具；同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派系斗争的特征之一，就是其夸张的政治修辞——任何事情，都可以“上纲上线”到“道德”的高度。但是，也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人们越来越怀疑，如此夸张的政治修辞，不过是各个派系谋求私利的遮羞布而已，从高层的政治斗争到地方上的冲突，都是如此。如此，人与人之间不仅相互之间产生了疏离感，个人与国家之间也产生了疏离（Susan L. Shirk, *Competitive comrades: career incentives and student strategie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 ① 关于何谓“文化政治”，本书在此只能尝试给出一个大概的解释：首先，在“文化政治”的视野中，人们对于“政治”这一概念的理解，已与平常大为不同：“文化研究的影响之一是它改变了什么是‘政治’的观念。事实上，那些在对文化的研究中想要采用‘文化政治’这个术语的人，大多会主张‘任何东西都是政治的’。他们借此旨在说明任何东西都是一个被争夺的权力关系问题……这意味着从更惯常的关于什么是政治的观念——议会、政党、国际关系、国家制度、官僚机构、工会等——转移开，并拓宽研究的（转下页注）

(接上页注②)领域,把政治(学),还有日常生活的政治(学)都包括进去。”(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第228页)而单世联则对所谓“文化政治”一词中“文化”的义涵,有更为细致的概括。

……如果说现代政治关注于改变经济与国家的结构,而文化政治则关注于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目的在于推翻特殊机构中的权力与等级,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之下解放出来,解放受到资产阶级社会现实性原则压制的创造性精神。“文化政治”不是指文化可能具有政治功能,也不是指文化革命作为政治革命的先导,而是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权力和斗争的场域,它既可以巩固社会的控制,也使人们可以抵制与抗争这种政治。第一,“文化政治”的“文化”不是阿诺德/利维斯传统和席勒主义的那种普遍性的力量、共同人性、共享的价值观,而是从抑制特殊、逾越鸿沟的普遍性力量转成为冲突的地带和斗争的场所,是对一种特殊身份——国家的、性别的、种族的、地域的——的肯定而不是超越。第二,“文化政治”的“文化”不是先验存在的本质的表达形式,而是创造新的本质、新的社会形式、新的行为和思考方式、新的观念的社会和物质的力量,是对“命运”、“自然”和“社会现实”这些似乎预先存在的東西进行重组,可以维护也可以质疑政治惯例、道德规范、社会实践和经济结构。第三,“文化政治”的“文化”不是反映现实的镜子或建基于经济/政治的“副现象”,而是在建构我们对现实的感受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形象和符号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的现实,随着文化大规模地扩展、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的政治潜能也获得了新的实现空间。要言之,文化不再是普遍的观念性存在,而是物质实践、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单世联:《文化、政治与文化政治》,《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而在克里斯·巴克(Chris Barker)看来,所谓“文化政治”,其核心要义,即在谁有权来“表征”世界,并使之获得合法地位——根据他的说法:

文化政治与命名处于通常意义和“官方”版本的社会和文化世界之中的物体和事件,并因此使之合法化的权力有关。文化政治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文化乃是这样一个场域,在其中,为了取得优势地位,互相处于竞争状态的意义和关于世界的说法彼此斗争。特别是,意义和真理在权力类型的内部被铸成,且面对论争的过程。因此,文化政治可被理解为表征世界(represent the world)且使得某类描述“生效”的能力。在此,通过对社会秩序和未来可能性的重新思考和重新描述,社会变革成为可能。

一切形式的文化表征天生就具有“政治性”,因为它们与这样一种权力有关,这种权力使得某类知识和身份得以存在,而拒斥其他类型的(转下页注)